

城市精神文化论

鲍宗豪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200243)

[摘要]城市精神文化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而言,它是城市人的精神象征,是城市的精神文化现象。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不同时代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常常以不同的艺术样式(如文物、典籍等)展示该城市的生活、人情、风貌,体现该城市区别其他城市的精神文化特质;在城市文化形态中,渗透着浓浓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城市人文精神是城市文化的灵魂,是城市精神文化的本质。城市风格是城市的内涵、城市的魅力,城市魅力则在于城市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外在的精神风貌;城市精神气质与精神风貌的和谐、统一,是城市最具风格魅力的状态,是对城市精神文化品质的最好展示。城市制度则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城市精神风貌和精神气质的特点、品质、价值和发展趋势,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城市精神文化的生产和精神文化生活。

[关键词]城市 精神文化 价值意蕴

[作者简介]鲍宗豪(1949—),男,浙江省奉化市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哲学、文化与现代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06)01-0017-08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记忆载体,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文化塑造城市,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对城市文化的研究,广义上可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不同的维度展开。本文从城市的精神文化视角研究城市,进而揭示城市文化的深层价值意蕴。

一、城市精神文化的历史孕育

城市精神文化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而言,它是人类在发展城市的实践中所创造的文化观、文化思想、文化艺术、文化产品,是人类发展城市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成果,是城市人的精神象征,是城市的精神文化现象。城市的精神文化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拥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城市的精神

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印刷媒体、电子媒体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体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以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于城市市民的大脑中,表现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之中。市民的生活习俗、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追求,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折射着一个民族的精神。

城市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可以说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因而对城市精神文化的研究应先从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中,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发现城市精神文化的一般与个别的特质。

(一)城市功能与城市精神文化

从城市功能的历史变迁中,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精神文化的一般特质。古代中西方的城市,其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如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

能扼守交通要冲,防守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管子·度地》记载:“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墨子·七患》记载:“城者,所以自守也。”在古代,“市”是商品交换之所。《周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市有大市、早市、晚市之分。据《周礼·地官·司市》记载:“大市,日昃而市,百姓为主;朝市,朝时而市,以贾为上;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从这句话可看出古代城市的简单功能:以军事防御为主同时兼有商品交换的功能。

中国史书亦有不少记载表明,三皇五帝或部落首领建都、筑城的主要目的是“卫君”、防御。如在《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中,都有关于三皇五帝建都的片断记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对其作了整理,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三皇五帝之都的地点。其所录三皇之都为:“伏羲都陈(今河南陈县);神农都鲁(今山东曲阜),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又迁涿鹿。”五帝之都为:“少昊都穷桑(今山东曲阜);颡(项)帝都高阳(今河南濮阳);帝啻都亳(今河南偃师),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今河北唐县),后徙晋阳,即帝位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舜始封于虞(今河南虞城),即帝位都蒲坂(今山西蒲州)。”

在西方,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中东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早期城市布局在河流沿岸便于灌溉和向周围征集农产品的地带,以供应帝王和贵族们的消费需求为主,集中居住有商人和手工业者,王权与神权相结合,城市内有大量的寺庙建筑,是政治、军事和宗教中心。早期城市多为准军事性城堡,是一种贮存据点,用以存放自有的或战争中掠夺而来的粮食、美女等财富,并防范村民的骚乱和外敌的入侵,防御功能十分突出。城墙、要塞、碉堡、哨塔、壕堑、运河构成了城市的物质结构形态和景观特征。与早期城市的防御功能相适应,城市的精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深深烙有防御功能的痕迹。中国的万里长城虽是一种物质文化,但长城物质文化中的本质精神则是“防御”意识、“自卫”精神。长城最早是从两千二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开始的,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达到非常频繁的地步。为了防止来自北方的突厥袭击,各诸侯国在北部修建了长城。后来,各诸侯国之间也筑起了长城,进行自卫。保存到今天的有燕、赵、魏、齐各诸侯国长城的遗迹。如今在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欧洲许多国家看到

的城堡遗址,当时也是为了防御。

中世纪时,农业生产技术、交通手段、建筑艺术都较早期有了很大进步。城市农产品的供应渠道由掠夺变为贸易,农业成为城市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的频繁,“城”的防御功能逐渐淡化,“市”的商业流通功能日趋强化,城市对周围腹地的吸引和辐射功能不断增强。城市的精神文化(如科技发明、文化艺术)也与城市功能的变化相适应。如中国唐宋时期,兴盛的海外贸易诱发了对航海指向仪器的需求,指南针开始应用到航海上,促进了航海技术大发展。史籍中最早记载到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是在北宋。朱彧在他的《萍洲可谈》一书中记述了中国海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他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大约在公元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中国的指南针由海路传入阿拉伯,然后再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16世纪新航路的开通和新大陆的发现,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为工业生产提供了新的动力,促使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机器大工业的蓬勃兴起,使城市从此有了自己的产业体系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以及人口和资本的大量集中,更加快了城市的发展步伐和城市化进程。在机器大工业和商业贸易的驱动以及铁路、轮船、公路、航空等现代化运输体系支撑下,近现代城市以迅猛之势扩大,城市功能日渐拓展完善,城市开始具有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娱乐等功能,城市的精神文化也伴随着城市功能的拓展,日渐丰富多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二) 城市记忆与城市精神文化之根

城市的记忆无疑是一种复杂的组成。地形地貌、森林水力、河流山脉、居住形态、建筑遗址、公共场所、文化气质、民族情调……这些是形成一个国家和民族认同性、构成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

无数的城市史告诉我们,城市不是历史教科书中枯燥的数字和资料,而是活生存留于城市空间和时间中的生命的热度、岁月的痕迹、文化的积淀,是城市精神文化之根。譬如,上海市的精神文化之根,其源头竟在六千年前。近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先后被发掘,这对于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具有直接意义。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古墓葬的清理,古代陶瓷、铜铁器的发现,炊器、盛储器、食器和酒器等先民

日常使用的器物的出土,古代建筑遗存的显露,极其恢弘地展示了上海市古代精神文化中的社会风情、生活长卷、起居变迁和文化艺术。从距今约六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五千年前的崧泽文化、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和三千七百多年前的马桥文化依序演进,上海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精神文化之血脉清晰可见。这是城市的文明之源、精神文化之根,是绵延六千多个春秋的城市精神文化的先河和根基。

然而,盲目的建设和更新却往往割断历史的文脉。英国的许多作为产业革命发源地的城市,如谢菲尔德(Sheffield),历史建筑已所剩无几,古城风貌也荡然无存。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末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世俗建筑被拆除,很多情况下仅仅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道路的要求。在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的千年古城墙一夜之间惨遭摧毁,曾是明代抗倭前线、清代鸦片战争的主战场、宁波商帮发祥地的定海古城在“旧城改造”的名义下被夷为平地,作为北京民居灵魂的四合院几近消亡……人们居住的城市,正在以远离多样性、差异性和历史文化特色的方式失去记忆,缺乏精神文化。战争、愚昧和无知,给城市带来的破坏和破坏性的建设以及修复,对城市造成的伤害是同样深重的。今天,只有在经过了无数教训和挫折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复杂的组成部分,城市的各要素所具有的种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它们饱含着从过去时代传递下来的信息,是历史记录的真实载体。文献记载无论多么动人有趣,在客观上都不可能比得上历史遗物的真切实在。承载与存留、拯救与跨越、追溯与见证,城市未来的脉络其实就保存在城市的记忆中。

(三) 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精神文化特质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常常是该城市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精品中——以实物或非实物的形式积淀下来。不同时代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常常以不同的艺术样式(如文物、典籍等)展示该城市的生活、人情、风貌,体现该城市区别其他城市的精神文化特质。例如,中国的开封是历史上著名的宋代东京城(又称汴梁),其文物古迹所呈现的主要是宋朝的精神文化内容和形式。开封的铁色琉璃塔、繁(音婆)塔都是宋代的文物遗产,大相国寺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但使人联想到的仍然是脍炙人口的宋代轶事。安阳城内外留有各个时代的文物古迹,而最重要的,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早的都城遗址——殷墟遗址。因此,殷墟王宫遗址、墓葬及与此相关的文物陈列,是展现

安阳古都精神文化生活的最主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北京两千多年的建城史,积淀了它雄厚而又独具魅力的传统文化。它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包含了很多历史性的审美因素。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古都,北京拥有按照传统的“天人之学”设计而成的结构对称、方正典重的宫殿街衢,以及四合院式的规整严实的平民建筑,它的生活节奏给人一种中古社会的从容迂缓的稳定感,展示出一种东方情调的人生境界。整座城市弥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浑融的古典气息。从根本上说,北京文化是一种依靠道德维系的、基于人情礼数的文化,它包含着人的尊严、人间的温情以及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中国人传统的理想和希望,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北京的就是中国的。

(四) 历史文化遗产与制度、信仰、价值观

历史文化遗产,其实也是人类过去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自身创造与原创造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因此,过去和传统往往以历史文化遗产为桥梁而源源不断地涌向现在。现代都市人如果想在当下清醒地行动、有效地创造,就只有从过去、传统、历史文化遗产中获得认识自身以及环境的必要知识,认清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现在何处,能够而且应当干什么,以及将走向何方。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能满足现代都市人“求真”的需求,而且也能满足现代都市人“求善”、“求美”的欲望。正如古罗马史学家塔西陀所说,“历史之最高职能在赏善惩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①。由于这个缘故,塔西陀的著作被称为“惩罚暴君的鞭子”。如果将塔西陀的观点加以引申,那么可以说,过去的、传统的东西以及历史文化遗产,都是主持人类正义的法官,它们具有赏善惩恶的功用。从希特勒制造的康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以及侵华日军制造的平顶山“万人坑”中,人们可以知道什么是“恶”;从汤阴岳飞庙中,人们可以知道什么叫“善”与“恶”,什么叫“忠”与“奸”;从北京圆明园遗址和广州三元里抗英遗址,人们可以知道什么叫侵略之“恶”,什么叫反侵略之“善”;从中国历朝的古都遗址

^① 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第246—24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中,人们可以理解“百姓是水,君主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二、城市形态与城市的精神文化

城市精神文化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有的学者认为,它包括观念文化、知识文化和艺术文化;也有的学者认为,城市精神文化虽不同于物质文化,但它应反映城市物质文化的成果,以及城市的制度安排,它是城市精神文化的另一种表述。本文不想拘泥于应包含哪些方面的讨论,而是汲取其中的积极思想,着重从城市形态、城市风格、城市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揭示城市精神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一) 城市空间与城市形态

由“城”、“市”到“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从城市空间层面上来看,实质上是城市空间(由“镇”、“小城市”到大中城市、特大型城市)不断扩展的过程。对城市空间的不同认识、理念和价值观,指导着城市规划设计者对城市空间的布局。伦敦、纽约、华盛顿、悉尼、东京与北京、上海城市形态的差异,既是折射出不同城市的规划、设计师对城市历史建筑和城市形态布局的理念与价值观,又是不同城市的历史文化、国民文化观念、文化精神的反映。这里不可能全面阐释城市空间,只想着重揭示城市开敞空间的社会文化含义。

所谓开敞空间(Open Space),迄今为止还没有十分准确的定义,综合国内外有关的文献大致可以表述为:开敞空间通常是指允许公众进入,具有一定公共设施、一定规模自然生态基础或人文内涵,富有景观特色的地段或地区。当然,这还是一种非常直觉化的景观定义,它在于强调“开敞空间”最重要的空间特征——具有人文或自然特质、一定的地域和可进入性。因此,从这个定义上可以引申出两点:一是从西方开敞空间的起源和发展来看,更强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即可进入性),所谓特权阶层(如皇家)的私家住宅、花园或者深山雪原中的原始地区,自然不在其列;二是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开敞空间分为各种地域类型,比如从内在特质可分为生态型、景观型、人文型,以城市作为参照可分大城市型、郊野型等等。不同类型的开敞空间具有不同角色、作用和相应的规划要求。

一百五十多年前,怀着建设新世界理想的美国人面对快速工业化带来的诸多城市病,尤其是城市环境的急剧恶化,在 F. L. Olmsted(1859 年)的率领下首先在纽约建设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开敞空间“纽

约中央公园”,改善了城市机能的运行,开创了促进城市中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新纪元。自纽约中央公园的建成及芝加哥为世博会(1893 年)进行了城市改善后,欧洲各城市也相应掀起了“城市美化运动”,逐步建立与完善了城市开敞空间系统。

1990 年以来,欧洲城市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以及全球生态和激烈的城市竞争,解决深层次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城市规划的重点。个体的人性需求继续得到重视,但更多地转向对不同文化、阶层、种族、年龄等社会群落的关注。21 世纪欧洲城市开敞空间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被提高,它能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为不同观点的表达提供场所(最著名的如英国海德公园内的 Speak Corner)。所以,21 世纪对城市开敞空间的要求,除了传统的景观、生态考虑以外(传统开敞空间的考虑是为了保护、提高自然资源和系统质量,或给人们的消遣活动提供场所),更重要的是要求它能够支撑和促进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主精神、社会要素等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与融合(自然从城市规划建设的角度看,城市开敞空间有时也是被用来进行社会空间分隔的一种有效方式),也就是注重如何使之更具有场所吸引力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 城市形态结构的社会文化价值

在群体认知层面,对城市形态结构的认识与评价是人们对城市的个性、地域文化、环境文化整体的认知与评价。但是,城市形态结构并非静态的,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市形态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在城市形态结构的变化中,体现着该城市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一是城市形态结构变化对社会公正的影响。1949 年,美国城市改造曾以住房建设和城市更新为重点,试图在市场机制忽略社会公正的情况下,由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解决城市破败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并兼顾城市居民的住房福利。但是在操作过程中,由于各大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各级官僚机构的低效,致使低收入的城市居民并没有从城市改造中得到多少益处。相反,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少数族裔社区邻里间的传统联系被打破,贫困家庭从一个贫民窟流落到另一个贫民窟,给这些家庭的成员在经济、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造成了很大压力。城市中心地区的贫困、失业、青少年辍学、犯罪、吸毒、未婚先孕及单亲家庭的增加等经济社会问题,无不反映城市政策的失败,并遗患当代。

联邦政府最终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放弃了城市更新计划和积极的公共住房政策,但其对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导致的中心城市的衰落,所反映的市场机制的缺陷以及地方政府的结构性问题,足以给城市化进程中的其他国家提供警示和借鉴。

二是对城市形态结构有目的的改造。它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城市社会秩序的重建。城市是社会政治秩序的载体,城市的形式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政治色彩,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如此。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城市设计领域涌现出的一些重要的城市设计构想,都往往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构思,而是建立在社会理想的基础上,试图寻找一种人类社会的理想城市蓝图,是社会变革理想在物质环境上的表达。这样的城市设计往往与社会改革相关,它们更多关注大规模的城市形态,与传统的城市规划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们往往立足于大的社会背景,希望通过技术的手段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或者为城市解决某些深层的社会问题。

19 世纪末,严重的城市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1902 年,英国的培比尼泽·霍华德(E. Howard)出版的《明日的田园城市》,设计了一整套城市和社会改革方案,包括社会、经济地理和城市建设三个基本方面的概念。田园城市理论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它首先把理想的城市模式变成可以操作的现实,在解决工业化带来的城市问题方面迈出第一步,为以后的新城建设、卫星城镇、有机分散等理论的酝酿打下基础,是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的重要财富。这一理论还直接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城市开发实践。自 1904 年以来,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俄国和美国等先后成立田园城市协会,开展了大量实践活动。霍华德的著作在指导现代城市规划实践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本著作都望尘莫及的。

(三) 城市“形态”与城市精神文化

城市都有其外在形象,从民居、建筑、街道到城市文化景观,都是城市的一张名片,是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国内外的一些历史文化名城,之所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旅游、观光的首选,在于其特色鲜明、令人难忘的城市文化形象。

西班牙巴塞罗那是一座颇多哥特式建筑的老城。巴塞罗那的老城非常壮观和协调,是欧洲最著名的具有中世纪风格的城市中心之一。街巷道路的布局呈十字棋盘格局分布。老城区哥特式街区的那些历史

性的建筑物大多都是 13—15 世纪建造起来的。哥特广场是由大教堂和古代皇宫组成,这里曾是哥伦布在 1492 年发现新大陆后航海归来,受到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接见的地方。其周边为 14 世纪的建筑群,包括毕加索博物馆。建筑物上有许多尖塔,还有很多雕塑和彩绘,每一个雕塑和彩画都向人们讲述一个宗教故事,从中可以想见当年街区的豪华和辉煌。

在中国的城市文化形象中,且不说千年古都西安、北京,就银川、杭州、哈尔滨、武汉、长沙来说,就各具独特的城市文化风采。银川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是公元 11—13 世纪曾经作为“夏国”即我们今天称为“西夏王国”的国都。银川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由此而来。杭州这个城市里里外外到处是水,有钱塘江的江水、大运河的河水、西湖的湖水,有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有天上落下的雨水,还有地下冒出的井水,甚至还有钱江潮带上的海水。水是平滑、柔顺的。丰沛的水不仅滋润了杭州的青山、树木,还塑造了它的城市性格。杭州是个柔情似水的城市。如果说武汉是一颗珍珠,长江便是那根串珠之绳,从武汉穿心而过。武汉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本乡本土的味道,和弥漫在市井中的商业俗气混杂在一起,格外给人以一种土俗的感觉。幸亏有长江,是长江使这座城市充满了一股天然的雄浑大气。这股大气,或多或少冲淡了武汉的土俗,甚至使得生长于此的武汉人说话也充满阳刚。他们豪放而直爽,说话高声武气,颇有北方人的气韵。长沙的景观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山、水、洲、城。“山水洲城”里的“山”,当然指的是岳麓山,它是方圆八百里的南岳七十二峰之最末一峰,湖南省的一些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多汇聚于此。山上的文物真是太多了,从西汉以来,历朝历代几乎都有遗迹可寻。其中以爱晚亭、岳麓书院、麓山寺、望湘亭、唐李邕麓山寺碑、宋刻禹王碑最为有名。而近代史上的革命志士黄兴、蔡锷、陈天华、焦达峰、刘道一、禹之谟、陈作新、蒋翊武、黄爱等均安葬于此。草木青青,虫声唧唧,你只要一弯身,仿佛就可以随手握一把浸透着墨迹或血迹的历史。

显然,在上述城市各具风采的文化形态中,渗透着浓浓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城市人文精神是城市文化的灵魂,是城市精神文化的本质。城市的人文精神渗透于城市文化的“硬件”与“软件”之中。人文精神又体现在城市文化的各个层面:在城市观念文化层面——如文化精神,心理层面——如市民自我超越意识;在制度文化层面——如城市民主精神,日常生

活层面——如城市风俗人情中折射的民族精神,物质层面——如城市人文理念和历史文物中的精神文化积淀,技术层面——如技术文化、技术人文精神,等等。城市文化建设的步伐虽然把一些陈规陋习、陈词滥调抛到了历史车轮的后面,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使一些城市更注重经济实力,但优秀历史文化与科学人文精神,永远是城市的灵魂。这几年,一些城市是发展了,但城市自家的文化何在呢?一些城市的文化看起来很热闹,有数不清的这个节、那个节,但这仅仅是城市生活表面的一层油彩而已,其内心是苍白的。有的城市要成为全中国、全世界异域文化展览的码头,但自家的文化在哪儿呢?自家的文化精神是什么?各大城市在发展高科技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更应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生活质量、人文素养,在追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实践中,需要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展示大城市、国际大都市的精神文化。

三、城市风格与城市精神文化

城市风格是城市的内涵、城市的魅力,城市魅力则在于城市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外在的精神风貌。城市精神气质与精神风貌的和谐、统一,是城市最具风格魅力的状态,是对城市精神文化品质的最好展示。城市风格所体现的城市精神文化,集中透过城市的建筑、城市景观和城市的人性化空间显现出来。

(一) 城市建筑的人文内涵

城市风格的第一印象是建筑。富有风格内涵的、保留着历史文脉的建筑,是城市风格的外在表现和依托载体。当人们漫步在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目睹一栋栋建筑,像浏览一页页翻过的书页,人们就是在体验品位这座城市的风格,在和这座城市的精神文化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人们不仅追溯了它过去苍老的往事,也可以触摸到它未来的心跳。

可以说,城市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绘画、实用的雕塑,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而且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丰富的人文内涵,是形成不同文化氛围和社会情调的重要因素。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风格的民居;美国纽约的摩天大楼与中国上海的摩天大楼,虽然都是现代化建筑,但也具有不同的文化韵味;中国北京的紫禁城与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虽然都曾经是皇宫,但却具有东西方的不同气派、不同的人文历史内涵。

不仅城市中的那些有形的物质实体,鲜明地显

示了城市的精神风貌,而且一个城市的布局、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精神文化特征。比如,古希腊的城市广场,是希腊人聚集在一起议政、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这个开放的场所既显著地体现了古希腊民主的城市精神文化,又给古希腊民主精神的进一步拓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广场形态,反映的是与西方城市明显有别的传统精神文化。比如,清代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场院虽然十分宽阔,却是普通人绝难进入的,不具备广场的开放的公共性。因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广场空间形态是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文化相对应的,体现了封建皇权对社会空间的严密监控。显然,不同城市的建筑、广场以及布局体现着不同城市的文化韵味,并在城市的演进中日益积淀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二) 城市景观与文化品位

城市景观是城市的亮点,从整体上展示城市风格。城市的景观美包括大区域的整体景观美和某些重点建筑物的个体景观美。在人们日益重视城市景观,城市景观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何搞好城市景观建设,如何评价城市景观,则成了城市景观品位高低、能否展示城市风格——与城市风格和谐还是相悖的关键。当然,由于人们的视角、知识结构、情趣等的差异,对城市景观的品位会有不同的认识。这里,笔者提出衡量城市景观美的三大审美准则,为提升城市精神文化品质提供参照标准。

一是互补协调准则。所谓互补协调,是指不同性质、特征、风格、情调的东西以一定的形式、方法和和谐组合,融汇成互相补充、相互协调的风格和特征。互补协调作为衡量城市景观的审美准则,它囊括了城市景观中许多具体的内容,如实体(建筑物)与虚空(周边空地)、开敞与闭合、含蓄与暴露、收与放、曲与直、动与静、明与暗、浓与淡、主与次、轻与重等等。城市景观如何将这些对立着的东西协调组织在一个统一体中,无不显示了城市决策者、设计者、建设者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法,进而显示了城市精神文化的品位。

二是层次序列准则。所谓层次序列准则,就是考察城市各部分、各方面、各层次的景观及其文化内涵,看该城市建设是否整体有序,是否有明确的主题、清晰的层次,从审美的角度衡量城市建设文化品位的高低。成功的高品位的城市建设就是要把握好规划、设计以及具体的建筑、管理等环节,使城市重

要的区域、街道、中心场馆、建筑物等,除了能充分发挥其使用功能外,还与城市的历史渊源、山水地貌、气候环境、城市建设发展的重心和走势、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模等等联系起来,并巧妙地将它们凸显出来。一幢重要的建筑物其造型、位置、风格、尺寸、色彩都应该考虑到上述各种因素和联系。一片建筑群所考虑的因素就更复杂了。除了上述因素和联系外,还要考虑楼与楼之间、楼宇与广场绿地之间的照应顾盼等。如何使新旧建筑物层次分明又衔接自然、布列有序又浑然一体,这都显示了城市规划者、设计者、建设者的文化理念、文化素质和城市的文化品质。

三是情景交融准则。所谓情景交融准则,就是考察城市建设的区域、街道、重要场馆、活动中心等等景物,能否通过其形状、态势、材料、色调、日照、灯光、林木、花卉、水榭、亭台楼阁、山石等,引起观察者的联想、顿悟、遐思,产生与上述景物的主题思想、意境共鸣的情感。从审美心理的角度看,城市建设的景物是能给人以心灵感应的,并能诱发兴奋、愉悦、激动、依恋、悲痛、敬仰等特殊的复杂情感的。如正方形有质朴、端庄的感应,自由曲线有奔放、随意的感应;绿色有自然、健康的感应,黑色有沉闷的感应,白色有纯洁的感应;小桥流水有雅致、清幽的感应,亭、廊有亲切、安逸的感应;开敞空间有舒畅、轻松的感应,封闭空间有压抑、紧张的感应;松柏有气节、高尚的感应,水莲有清洁、刚直的感应,翠竹有进取的感应,等等。如果观察者踏足景物现场就产生此类情感,就可以认为达到情景交融的审美准则了。这是较高层次上的城市景观追求,它不仅在情景交融的深切内涵中展示城市风格,而且在城市人的情感、情怀、情操与城市景的“交融”中实现了城市精神文化的价值。

(三) 城市风格与人性化空间

城市风格,不仅要在现代高技术社会条件下提供人们身体的栖息场所,更要为灵魂的栖居建设一个人性化的空间。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任何违背人性的想法、做法,都是与城市风格追求的终极目的相违背的。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现代化迅速改变了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成为郊区的对立面。汽车化一方面使城市不断向四周无序蔓延,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正在摧毁历史城市的结构。汽车成为城市空间的主导,行人要战战兢兢、气喘吁

吁地小跑着走过马路。以人为本变成以车为本。长此以往,我们的城市还将是美好的吗?这样的城市化真是我们的理想吗?

我们向往和憧憬一个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为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格所吸引。在巴黎,我们时时为其高雅浪漫的拉丁气息的风格所陶醉。在罗马的黄昏,目睹台伯河的静静流淌和即将为暮霭所吞没的古罗马废墟,我们为其载满历史苍茫感的风格而感动。在威尼斯,你处处可以呼吸到刚朵拉小舟挟着亚德里亚腥湿海风扑面而来的热情。维也纳的一草一木都洋溢着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风格。在伦敦,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源于英国文化传统的绅士风格,甚至那满街的出租汽车,虽有着现代的发动机,却保持着19世纪的老式模样。我们怎么能想象,打乱了北京中轴线城市布局,没有了故宫和四合院,这些概括了京城从庙堂到民间极具风格化的居所,北京城还会有吸引中外游人的风格魅力?

四、城市制度与城市精神文化

如果说城市形态和城市风格较直观地映照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和精神气质,那么,城市制度则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城市精神风貌和精神气质的特点、品质、价值和发展趋势,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城市精神文化的生产和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对城市精神文化的研究必须进一步阐释城市制度、城市制度文化。

城市制度本身就是“人文”的、“人化”的,即城市制度离不开人,它是靠城市人设计、执行、遵守的,离开了城市人,也就无所谓城市制度。城市制度的两端:它的确立(起点),它的执行(落脚点)都离不开人。城市制度折射着城市人的内在素质,城市人的文化理念、文化素质高低决定着城市制度设计水平的高低。城市制度文化是城市制度的观念内核,是设计、执行、监督、变革城市制度的人们的理性原则、价值取向、理念追求、道德标准、利益调整等的观念体系,反映出城市制度设计的主体追求什么、捍卫什么、贬斥什么、接受什么的理性思索和道德底线,是主体化、内在化的关于城市制度的观念系统。因此,可以这样讲,有什么样的城市主体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制度,有什么样的城市精神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制度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精神文化的产物,城市制度文化内涵于城市的精神文化中。

不同的制度文化反映着不同的精神文化特质、

不同的民族精神。体现中国精神文化本质的儒家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伦理观，一直是中国制度设计中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这一传统告诉人们，人人都有良知天性，人人都懂得“仁爱”，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懂得自律，懂得“吾日三省吾身”等等；只要有了这种道德，就能够做到“推己及人”，能用善良仁爱之心、高尚有德之为去对待他人；人人皆舜尧，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道德的修炼成为谦谦君子。道德的获得外靠舆论，内靠良心，因而身外的制度是多余的、不必的，那是为“小人”设置的，“君子国”中的人是不需要的。统治者控制住舆论，个人把持住良心就可以了。于是，社会充满了仁爱、礼仪之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城市制度设计的现实却走了一条与此不相吻合的路径。在中国的城市制度设计中，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是很少的。中国的城市制度（城市管理制度）常常定位于管人、约束人，缺乏体现对人的真切关怀与平等的城市精神文化。也就是说，制定城市制度的文化中，平等、人道、人性的因素少，而等级的、歧视的“文化无意识”则较多。

西方社会对人性的预设是“性恶论”，认为人都是“无赖”、“魔鬼”，不能依靠“圣贤道德”归顺人性、治理国家。于是，不断地制定制度、法律来限制恶的人性，限制人的恶念、恶行，以达到治理城市、治理社会的目的。怎样才可以使带有“恶”的人接受、服从制定出来的法律和制度呢？那就必须让他们承认：制度和法律代表的是“公意”，在制度、法律的设计中包含了对社会公民，自然也包含了自己在内的人的权利与利益的最大、最根本的关照，体现着对他的不伤害，也不伤害别人的公正、平等、正义的成分。所以，城市的发展，一方面是城市法治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社会公正、平等、自由的探索、

落实也越来越多，看似相对立的两极是统一的。所以，城市法治必然更人道、更人性，更体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

西方社会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了保证人与人交往的契约论。“契约”是以平等、自由、权利为前提的，而不能以强制性为前提。这是一般契约与法律的不同之处。但契约也具有法律的意味，任何一方的毁约不仅是不道德的，也可能意味着是对法律的触犯。契约意识的形成、普及确立的是制度、法律的权威，严格的守法意识与成熟的契约意识是“孪生兄弟”。契约意识与法治精神是相伴而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所以，形成对城市制度内心认可的都市制度文化，与民众广泛地形成契约意识是分不开的。

当今中国城市制度的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城市制度文化的培育，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积淀，没有城市精神文化的引导，没有以民众内心的价值判断、认知标准、行为选择等作为外在城市制度文化的支持，城市制度是不能长久地发挥作用的。不是吗？“非典”疫情的出现，冲击着城市公共卫生的体制，冲击着行政管理体制，也导致了人们对生活陋习的思考。人们开始讲究公共卫生道德，开始注意个人卫生。但当“非典”疫情刚一得到控制，一些暂时改正的陋习又死灰复燃。这告诉我们，讲究公共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社会公德意识远没有成为人们自觉的行为。所以，没有文化支持的行为可能是偶发的、被迫的；有文化支撑的行为才是长久的、奏效的。城市制度的真正作用依赖于制度文化的形成，依赖于精神文化的指导，依赖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积淀。

（责任编辑：常山客）

On The Urban Spiritual Culture

Bao Zonghao

Abstract: In relation to the urban material culture, the urban spiritual culture is the symbol of citizens' mind and the phenomenon of city's culture life. It is not only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but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cultural heritage accumulating down in different ages frequently demonstrates the city life, the human sentiment and the feature of a city by different artistic styles (such as culture relics, ancient records, etc.). It also manifests the urb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that distinguish other cities.

Key words: city, spiritual culture, emotion of value